

當代中國大寫意

上层卷

文坛大腕状摹人生
悲喜交织色彩纷呈

一部鲜活的野史
一幅感人的长卷

大型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大写意
上层卷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 维

封面设计：王虎鸣

当代中国大写意·上层卷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5 字数：52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1483-7/I·370

本册定价：17.00 元 全套定价：98.00 元



英雄长歌，一代伟人豪情溢大江，壮士悲叹，万古留名，是非谁评说？本卷展示给您的，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一首首令人回味的诗

上层卷

目次

1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纪实	权延赤	1
2	邓小平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张卫明	58
3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吴 思	92
4	开国第一重大行动	杜卫东	186
5	魂系中南海	喜 民 耿 人	234
6	开国大典轶事	舒 云	320
7	一言难尽乔冠华	张 容	408
8	红墙内外的生活 ——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江青	权延赤	456
9	陶铸出行	权延赤	514
10	一个广州警卫与十个史名人	权延赤	548
11	她为毛泽东侍讲诗文	叶永烈	585
12	四个秀才一台戏 ——周扬、康生、陈伯达和胡昭衡在“文革”前夕	权延赤	612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纪实

权延赤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茏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 130 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怕死。”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

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像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的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

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一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懣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懣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

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根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的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

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不是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倚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胱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

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辞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在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的周恩来，开始了“抓

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境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

“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恩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恩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

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恩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

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向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

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 120 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停。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了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

从 1972 年 5 月 18 日确认癌症，到 1974 年 6 月 1 日住进 305 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 30 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